

“三重压力”下中小微企业精准纾困的经验研究

——基于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吴宝 金陈飞 黄琼贤¹

【摘要】：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冲击，精准纾困小微企业成为“六保”“六稳”工作的关键。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实现了园区平台载体与小微扶持政策有机结合，为我国精准纾困小微企业提供了新思路。本文通过准自然实验方法对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政策能有效降低小微企业实际税负、融资成本和用工成本，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非民营企业实际税负和用工成本降低明显，而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更为明显；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享受了较多的实际税负和融资优惠，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享受了更多的用工成本优惠。

【关键词】：中小微企业 精准纾困 小微企业园 减税降负 浙江经验

一、引言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稳增长、惠民生、保就业、防风险、促改革的重要载体，贡献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70%的GDP、60%的利润以及50%的税收。同时，中小微企业一般具有“低、小、散、弱”的特点，“先天不足”导致其在争取政策支持上处于弱势地位，长期面临“四贵三难”困境。¹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冲击下，广大中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涨、关键技术和部件断供、市场断崖式萎缩等困难，生存与发展局面空前严峻。然而，多年政策实践表明，“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型扶持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作用并不明显，纾困政策空转现象时有发生。直面三重压力的新挑战，做好“六稳”和落实“六保”工作，提高政策穿透力和实现精准纾困成为关键性的理论议题。

浙江是小微企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小微企业纾困的先行区和试验区。浙江以小微企业园为平台载体，整合各类政府服务事项和资源要素供给，精准把握小微企业政策需求，动态调整和优化政策组合，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小微企业园政策是具有浙江特色的精准纾困政策。浙江省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小微企业园区建设管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意见》《关于加快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强调要以小微企业园为载体加快降低企业成本，再创业态经济和小微企业集聚发展新优势。小微企业园成为精准纾困政策的重要创新政策工具并且解危纾困效果明显。调查显示，在受访的中小微企业中，75%的企业认为实际税负有所下降，接近80%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基本持平，70%的企业认为用工成本温和上涨。²浙江的小微企业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或产业平台，更是一个以小微企业园为载体的助企纾困政策大集合。

现有文献大多关注减税政策实施效果，对小微企业园等创新型精准纾困政策研究较少。本文基于小微企业园政策实施评估，总结了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浙江经验，为国家制定和实施小微企业组合式纾困政策提供经验启示。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研究小微企业园政策的成本纾困效应，并准确评估其对小微企业降成本的净效应；(2)基于异质性视角，考察小微企业园精准纾困的效果差异，探究企业减负“获得感”差异的影响机制；(3)兼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利用因果中介分析(CMA)模型厘清小微企业园政策精准纾困的生产率效应。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精密调度+柔性智造’构建全国统一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模式与路径研究”（20VYJ073）阶段性成果

二、理论基础

如何提高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精准度已成为政策研究的热点。总体而言，我国中小微企业精准纾困面临的关键瓶颈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小微企业本身的异质性问题。按照国家大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超过 99% 的企业都属于中小微企业。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内部存在巨大的规模差异、行业差异、地区差异，异质化的中小微企业政策诉求和政策感受差异巨大，精准施策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也各不相同，纾困诉求时常存在矛盾和冲突。二是现行扶持政策体系难以实现精准发力。小微纾困政策体系涵盖金融、财政、税务、人才、能源、创新、社保等各个政策维度，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将焦点放在地方政府容易掌握或更感兴趣的中型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身上，对更底层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民生小微企业关照不够。三是我国对中小企业的动态监测不到位。现行统计监测不能及时反映规下小微企业景气动态，无法体现异质性中小微企业的景气分化与生存痛点。因此，推进中小微企业精准纾困必须加强政策创新，找准精准纾困的平台载体，提高政策精准性。

小微企业园政策是浙江省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创新性地方政策。小微企业园政策出台之前，各类小微企业常因地理位置分散、信息匮乏而处于政策扶持的边缘。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扶持容易出政绩的大企业。建立小微企业园后，小微企业因政策需求相近而抱团，增强了与地方政府谈判议价的能力，提升了地方政府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的工作压力。同时，相关园区管理机构的配套增强了精准纾困政策实施的组织力量，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责任主体更为明确。为了推进小微企业园的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内实行全覆盖式小微企业园绩效评价，并将小微企业园绩效纳入地方政府考评体系，³ 小微企业园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关系。这相当于在小微企业园建设领域为地方政府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锦标赛跑道。具体的做法是，按绩效评价得分将小微企业园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小微企业园星级申报和评定。C 档及以上的小微企业园可申报星级，按发展水平从低到高依次确定为一至五星五个等级。在排位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会更尽心尽力地服务于自身所管辖的小微企业园，最大化上政下达和下需反馈的效率，进而实现政策的精准聚焦。

在政策实践中，如何精准支持中小微企业、提升中小微企业政策获得感还面临着较大的难度。小微企业纾困政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篮子政策”“政策组合拳”和“区位导向型的政策集合”。政策精准聚焦中小微企业是实现精准纾困的前提。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的核心在于通过地理集聚实现政策聚焦。小微企业园入驻企业全部为地方小微企业，客观上为精准服务小微企业提供了平台载体。与此同时，小微企业园发展业绩被纳入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中，有利于园区管理机构综合协调地方各部门扶持政策。例如，浙江小微企业园建设工作相关文件明确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创新和突破，抓紧研究制定加快小微企业园建设提升的实质性政策措施，同时加强与国土、财政、税务、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抓好政策落地实施，扎实推进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⁴ 结合浙江小微企业转型脱困，浙江省小微企业园政策实施中阶段性地开展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园区建设、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小微企业园金融服务、减负强企业专项等充分聚焦小微企业发展需求的专项政策。另外，园区管理机制也为动态监测中小微企业政策需求和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小微企业宏观动态监测的不足。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实现了园区平台载体与小微扶持政策的有机结合，为我国精准纾困小微企业提供了新思路。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小微企业园”是浙江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与载体，为小微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截至 2021 年底，浙江省分 8 批先后认定 1073 家小微企业园。从现实情况来看，小微企业园通过审核认定后，优惠政策明显增加，有助于驻园企业降低成本。因此，我们利用小微企业园认定带来的“质量”升级作为准自然实验的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 (DID) 方法识别小微企业园对企业降成本的效应。但是，小微企业园认定并非随机选择，需通过县市区三级审核；同时，同一时期的其他产业政策或区域政策也可能对企业降成本等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比较企业各类成本在小微企业园认定前后的变化可能会带来较大的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 (PSM-DID) 相结合的方法，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可比较性，以期

得到更为精准的分析结果。

根据 PSM-DID 方法的思路与逻辑,先通过逐年 PSM 匹配,构建一个与小微企业园企业(处理组)最具可比性的企业对照组;再利用 DID 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估计小微企业园对企业降成本的净效应,具体模型如下:

$$COST_{it}^{psm} = \beta_0 + \beta_1 \cdot Treat \cdot T + \sum \beta_x \cdot Control_{it} + \gamma_i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COST_{it}^{psm}$ 为表征企业成本负担的相关指标,包括实际税负、融资成本、用工成本,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企业和第 t 年; $Treat$ 为小微企业园识别虚拟变量, T 为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 $Treat \cdot T$ 的系数 β_1 测度了小微企业园认定前后被解释变量($COST$)的变化,反映了小微企业园认定对 $COST$ 的实际影响效果; $Control_{it}$ 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企业规模($Scale$)、企业利润($Profit$)、研发投入($R\&D$)、就业人数(Emp)、企业年龄(Age)、出口结构($Export$)、竞争程度(HHI)等, γ_i 为固定效应, ϵ_{it} 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浙江省 2 万余家中小微企业,包含了企业的基本特征、经营信息及企业填报的调查问卷。借鉴主流文献的处理方法,分别剔除工业总产值、营业收入以及就业人数为零或负数的样本,时间出现间断的样本以及企业地址信息异常或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2015-2021 年企业平衡面板数据集。

小微企业园名单来源于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为了与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相匹配,剔除生产性服务类小微企业园后,共得到 740 家生产制造类小微企业园;其中,2019 年 331 家、2020 年 211 家、2021 年 198 家。借鉴王永进和张国峰、林毅夫等的做法,本文采用对比信息来识别小微企业园企业样本。⁵ 具体识别策略是:如果某企业某年份的地址信息字段与上述小微企业园名单的模糊匹配相似度得分大于 70%,且地市、区县信息完全匹配,则将此年份的该企业识别为小微企业园企业;反之,则为非小微企业园企业。为保证模型估计的时间区间和样本数量,本文以 2019 年公布的三个批次小微企业园为研究对象,并剔除通过 2020-2021 年认定名单识别的小微企业园企业。

(三)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成本负担。实际税负、融资成本、用工成本均采用比率变量,以企业实际缴纳税额与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实际税负,⁶ 以利息支出与平均借款总额来测度企业融资成本,⁷ 以应付职工薪酬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测度企业用工成本。

8

核心解释变量为交互项 $Treat \cdot T$ 。其中, $Treat$ 是通过上文识别策略生成的分组虚拟变量,小微企业园企业赋值为 1,即为处理组,通过 PSM 匹配得到的对照组赋值为 0; T 为时间虚拟变量,小微企业园认定公布后的年份赋值为 1,反之为 0。

参考既有文献,本文引入企业层面、城市-行业层面的系列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Scale$),用营业收入的对数值表示;企业利润($Profit$),用利润总额与营业收入的比重来测度;企业研发投入($R\&D$),用企业研发投入的对数来测度;就业人数(Emp),用企业就业人数的对数来表示;企业年龄(Age),用当年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加 1 取对数来衡量。另外,城市-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出口结构($Export$),用企业出口额与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来衡量;竞争程度(HHI),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本文还设定年份、地区的固定效应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平衡性检验

采用 1：1 最近邻匹配方法，为 2019 年三个批次的小微企业园企业(处理组)匹配到唯一的非小微企业园企业对照组。PSM 匹配结果是否可靠，需要进行平衡性检验。匹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间的标准偏差越小，匹配效果越好。表 1 汇报了小微企业园认定对企业实际税负影响的平衡性检验。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均小于 10%，表明本次匹配方法合理、效果可靠，处理组和对照组符合可比性要求。PSM 匹配后，剔除未成功配对的 4 家企业，最终获得处理组企业样本 360 家和对照组企业样本 258 家。

表 1 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偏差 (%)	标准偏差减少 (%)	T 统计量
		处理组	对照组			
Scale	匹配前	11.013	10.494	45.3	97.1	6.09
	匹配后	10.937	10.952	-1.3		-0.18
Profit	匹配前	6.836	5.561	41.4	97.8	5.57
	匹配后	6.691	6.663	0.9		0.13
R&D	匹配前	7.326	6.331	54.2	96.6	7.29
	匹配后	7.230	7.197	1.8		0.27
Emp	匹配前	4.604	4.261	37.7	81.5	5.07
	匹配后	4.558	4.621	-7.0		-0.98
Age	匹配前	2.584	2.668	-18.8	59.7	-2.52
	匹配后	2.604	2.570	7.6		0.95
Export	匹配前	0.211	0.239	-11.0	90.2	-1.48
	匹配后	0.217	0.220	-1.1		-0.15
HHI	匹配前	0.687	0.616	19.9	69.1	2.67
	匹配后	0.676	0.654	6.1		0.84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 2 汇报了根据公式(1)得到的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PSM-DID)相结合的估计结果。第(1)(3)(5)列未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交互项(Treat·T)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小微企业园企业的成本负担更低。第(2)(4)(6)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交互项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小微企业园对企业减负降成本的作用十分稳健。由表 2 数据计算可得，在小微企业园精准施策的影响下，处理组企业相较对照组企业，实际税负降低 26.69 个百分点，融资成本降低 26.13 个百分点，用工成本降低 11.75 个百分点。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实际税负	实际税负	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	用工成本	用工成本
Treat • T	-0.4528***	-0.2669***	-0.2584***	-0.2613***	-0.1579***	-0.1175**
	(0.0876)	(0.0763)	(0.0740)	(0.0730)	(0.0515)	(0.0485)
Scale		-0.0608		0.0095		-0.1902***
		(0.0513)		(0.0594)		(0.0494)
Profit		-0.1961***		0.0101		-0.0518***
		(0.0152)		(0.0102)		(0.0088)
R&D		-0.0608**		-0.0167		0.0100
		(0.0279)		(0.0291)		(0.0193)
Emp		0.2851***		-0.0059		0.3220***
		(0.0542)		(0.0762)		(0.0683)
Age		0.0538		0.0452		0.0332
		(0.0922)		(0.0759)		(0.0546)

Export		0.0653		-0.0394		0.0080
		(0.1520)		(0.1576)		(0.1072)
HHI		-0.2118**		0.1054		0.0055
		(0.1070)		(0.1132)		(0.0671)
Constant	-1.5034***	-0.5681	-2.5784***	-2.7778***	-2.3998***	-1.6461***
	(0.0684)	(0.3793)	(0.0632)	(0.4517)	(0.0412)	(0.2783)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26	4326	4207	4207	4256	4256
R ²	0.0479	0.2286	0.0332	0.0358	0.1218	0.183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五、进一步讨论

(一)所有制差异

民营中小企业群体通常需要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和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⁹ 市场空间和要素成本“两头”受压。表 3 给出了按所有制类别进行分组回归后的结果。第 (1) (2) 列的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的减税效应在所有制类型上并无显著区别，但估计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可以认为民营中小企业的减税幅度相对较小。第 (3)–(6) 列的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显著降低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用工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协调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等政策。¹⁰

表 3 所有制差异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实际税负		融资成本		用工成本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非民营
Treat • T	-0.2341***	-0.4063**	-0.2906***	-0.2584	-0.0443	-0.2279**
	(0.0882)	(0.1674)	(0.0778)	(0.1592)	(0.0575)	(0.0908)
Scale	-0.0475	-0.0967	-0.0266	0.1095	-0.1594***	-0.2710***
	(0.0547)	(0.1151)	(0.0691)	(0.1059)	(0.0574)	(0.0802)
Profit	-0.2025***	-0.1747***	0.0113	0.0077	-0.0464***	-0.0692***
	(0.0173)	(0.0294)	(0.0122)	(0.0192)	(0.0101)	(0.0181)
R&D	-0.0598**	-0.0573	-0.0021	-0.0697	0.0003	0.0057
	(0.0298)	(0.0562)	(0.0371)	(0.0545)	(0.0206)	(0.0399)
Emp	0.2569***	0.4008***	0.0179	-0.0555	0.2522***	0.5415***
	(0.0603)	(0.1223)	(0.0911)	(0.1104)	(0.0833)	(0.0828)
Age	0.0853	-0.0522	0.0133	0.2328	0.0358	-0.0307
	(0.1064)	(0.1660)	(0.0810)	(0.2099)	(0.0630)	(0.0973)
Export	0.1740	-0.2709	-0.1091	0.2109	0.2211*	-0.3679**
	(0.1955)	(0.2833)	(0.2044)	(0.2576)	(0.1257)	(0.1622)

HHI	-0.3217***	0.1983	0.0659	0.1814	0.0578	0.0020
	(0.1202)	(0.2193)	(0.1216)	(0.2936)	(0.0764)	(0.1558)

Constant	-0.5794	-0.7642	-2.4517***	-3.9173***	-1.7223***	-1.4376***
	(0.4236)	(0.7810)	(0.4801)	(1.1841)	(0.3305)	(0.4831)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346	980	3234	973	3283	973
R ²	0.2384	0.2427	0.0415	0.0446	0.1738	0.306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二)行业差异

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成本更多来源于用工成本，而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融资成本的影响更加敏感。¹¹ 借鉴鲁桐和党印对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划分标准，表 4 给出了按行业分组后的回归结果。¹² 第(1)(2)列的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在减税效应上的行业差异较小，但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第(3)(4)列的结果显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不显著。这表明，小微企业园在降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融资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作用。第(5)(6)列的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对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成本有较为显著的作用。

表 4 行业差异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实际税负		融资成本		用工成本	
	劳动密集	资本技术	劳动密集	资本技术	劳动密集	资本技术
Treat • T	-0.2187***	-0.5312***	-0.0056	-0.3135***	-0.0979*	-0.2146
	(0.0793)	(0.1992)	(0.1801)	(0.0823)	(0.0508)	(0.1298)
Scale	0.0837	-0.1875	-0.0307	-0.0331	-0.2228***	-0.1548*
	(0.0618)	(0.1303)	(0.1286)	(0.0546)	(0.0542)	(0.0910)
Profit	0.0037	0.0127	-0.1644***	-0.2060***	-0.0444***	-0.0651***
	(0.0109)	(0.0199)	(0.0279)	(0.0179)	(0.0088)	(0.0185)
R&D	-0.0066	-0.0636	-0.0447	-0.0717**	0.0268	-0.0334
	(0.0280)	(0.0721)	(0.0790)	(0.0302)	(0.0187)	(0.0475)
Emp	-0.0620	0.2570	0.1861	0.3122***	0.3090***	0.3433**
	(0.0742)	(0.2039)	(0.1178)	(0.0601)	(0.0781)	(0.1341)

Age	0.0502	-0.0601	0.1530	-0.0018	0.0747	-0.0583
	(0.0889)	(0.1441)	(0.1865)	(0.1004)	(0.0560)	(0.1275)
Export	-0.0160	0.0712	0.2885	0.0373	0.1085	-0.4742*
	(0.1512)	(0.3897)	(0.3330)	(0.1693)	(0.1168)	(0.2562)
HHI	0.0599	0.3781	-0.2292	-0.2044*	-0.0377	0.1183
	(0.1167)	(0.2623)	(0.2610)	(0.1184)	(0.0716)	(0.1944)
Constant	-3.3567***	-1.3589	-1.2176	-0.6723*	-1.5252***	-1.3743**
	(0.4913)	(0.9626)	(0.9634)	(0.4071)	(0.3059)	(0.5849)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55	1771	2485	1722	2499	1757
R ²	0.0339	0.1488	0.2289	0.2473	0.1996	0.198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三)成本感知

企业家政策感知是衡量政策落地实效的重要标准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¹³但消极宣传、实施细则模糊等阻碍了政策落地、落细、落实。结合动态调查问卷中企业主对“企业生产总成本变化情况”“融资成本变化情况”“用工成本变化情况”三个方面的主观判断，拟合成总成本感知、融资成本感知和用工成本感知三个变量。¹⁴表 5 给出了小微企业园认定对企业成本感知影响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小微企业园精准纾困在总成本和用工成本方面具有较高的“获得感”，但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企业“获得感”不及预期。

表 5 成本感知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总成本感知	融资成本感知	用工成本感知
Treat · T	-0.3263***	-0.0861	-0.3059***
	(0.0588)	(0.0621)	(0.0725)
Scale	0.0256	-0.0259	0.1005**
	(0.0344)	(0.0369)	(0.0417)
Profit	-0.0049	0.0210***	-0.0197**

	(0.0090)	(0.0072)	(0.0097)
R&D	-0.0373*	-0.0095	-0.0200
	(0.0193)	(0.0207)	(0.0211)
Emp	-0.0263	-0.0266	-0.1469***
	(0.0405)	(0.0394)	(0.0484)
Age	0.0813	0.1205*	-0.0728
	(0.0621)	(0.0616)	(0.0699)
Export	-0.0956	0.0123	-0.2065
	(0.1159)	(0.1212)	(0.1334)
HHI	0.0710	-0.0371	-0.0765
	(0.0787)	(0.0882)	(0.0965)
Constant	2.4436***	2.1055***	2.8173***
	(0.3009)	(0.2901)	(0.3758)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12	4340	4298
R ²	0.0647	0.0363	0.069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

(四)生产率影响

精准纾困中小微企业的目的在于高质量发展，而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其生产率的持续改善。已有研究表明，减税降费可以缓解融资约束，¹⁵ 促进企业投资，提升企业生产率。¹⁶ 因此，为更加全面地评估中小微企业精准纾困带来的影响，在考察小微企业园对企业降成本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识别其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果。以小微企业园认定为处理变量，企业成本负担为中介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为结果变量，我们使用因果中介分析(CMA)模型来验证精准纾困的生产率效应。其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使用 LP 法测度。

基于准贝叶斯蒙特卡洛模拟，表 6 汇报了小微企业园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直接效应、总效应和中介效应率(中介效应/总效应)。结果表明，小微企业园精准纾困政策确实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降低实际税负贡献了 20.9%，降低融资成本贡献了 13.5%，降低用工成本贡献了 4.5%。

表 6 生产率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实际税负	TFP	融资成本	TFP	用工成本	TFP
Treat • T	-0.2756***	0.0760***	-0.2665***	0.0794***	-0.1033***	0.0815***
	(0.0381)	(0.0209)	(0.0388)	(0.0221)	(0.0262)	(0.0070)
实际税负		-0.0558***				
		(0.0083)				
融资成本				-0.0404***		
				(0.0094)		
用工成本						-0.0375***
						(0.004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8340***	3.7370***	-2.7098***	3.5540***	-1.8442***	1.3712***
	(0.2029)	(0.1109)	(0.2153)	(0.1248)	(0.1399)	(0.0384)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326	4326	4207	4207	4256	4256
R ²	0.2275	0.2287	0.0347	0.2246	0.2068	0.3228
平均中介效应	0.015	[0.011, 0.022]	0.011	[0.006, 0.017]	0.004	[0.002, 0.006]
直接效应	0.062	[0.019, 0.104]	0.070	[0.029, 0.111]	0.082	[0.068, 0.096]
总效应	0.077	[0.036, 0.122]	0.081	[0.037, 0.126]	0.086	[0.071, 0.101]
中介效应率	20.9%	[14.8%, 37.1%]	13.5%	[9.4%, 33.7%]	4.5%	[3.8%, 5.4%]

注：通过 1000 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模拟获得中介效应的估算结果。()内数字为标准误，[]内数字为 95%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与启示

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核心在于通过地理集聚实现政策聚焦，并将园区平台载体与小微扶持政策有机结合，从而为我国精准纾困小微企业提供了新思路。全省小微企业园专项增强了地方基层精准支持小微企业的组织力量，全省小微企业园的排位竞争机制也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支持小微企业园制度创新的政绩激励，增强其精准纾困小微企业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随着小微企业园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更多小微企业享受到精准纾困的组合式政策优惠，会在更大范围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推动小

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为我国政府进一步制定和实施小微企业精准纾困政策提供了经验启示。

借助浙江省小微企业园认定和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本文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对小微企业园的精准纾困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小微企业园政策确实能够改善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结论有：(1)小微企业园对企业减负降成本的作用十分稳健，平均降低实际税负 26.69 个百分点，降低融资成本 26.13 个百分点，降低用工成本 11.75 个百分点；(2)政策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存在异质性。小微企业园政策显著降低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以及非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和用工成本，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能享受更多的税收和融资优惠，劳动密集型行业则在用工成本方面享受了更多的优惠；(3)小微企业在总成本和用工成本方面更具“获得感”，在融资成本方面的“获得感”不及预期；(4)小微企业园精准纾困不仅起到了显著降成本的效果，而且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浙江小微企业园政策实施为我国制定精准纾困小微企业的相关政策提供了新思路，验证了产业平台建设和小微扶持政策结合能够较好地提升精准纾困的实施效果。其政策启示有：(1)借助于产业平台建设，实现了对小微企业的精准聚焦；(2)平台园区运行管理为精准政策实施及动态监测提供了顺畅的反馈机制；(3)专项的小微企业园区计划为各扶持部门形成系统合力并实现对底层小微企业的精准穿透提供了现实机制。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精准纾困小微企业的政策需求更为迫切，也对今后小微企业园政策优化和精准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1)要持续打好小微企业园“政策组合拳”，力求精准破难。加强要素谋划，丰富政策组合，强化企业纾困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与园区高质量发展激励政策相匹配，引导小微企业园提质增效。(2)要进一步探究企业政策获得感不强的成因，破解“减负永远在路上”难题。推进小微企业园数字化改革，不折不扣落实好减负降本政策，强调政策“执行力”“知晓率”“到达率”，提升小微企业的政策获得感。(3)在精准纾困小微企业的同时，要兼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协调推进减税、降费、降本政策，重视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强劲提升作用。

注释：

1 四贵：融资贵、用工贵、用料贵、费用贵，三难：订单难、转型难、生存难。刘道学、池仁勇、金陈飞：《景气指数：中小企业领域一项开拓性基础研究——中国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研究综述(2011—2017)》，《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

2 池仁通、刘道学、金陈飞：《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 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3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小微企业园区建设管理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意见》，2017 年 4 月 14 日，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7-04/14/c_129533783.htm，2022 年 4 月 18 日。

4 浙江省经信厅：《关于做好小微企业园建设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18 年 11 月 30 日，http://jxt.zj.gov.cn/art/2018/11/30/art_1663369_35694467.html，2022 年 4 月 18 日。

5 王永进、张国峰：《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

6 田彬彬、陶东杰、李文健：《税收任务，策略性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经济研究》2020 年第 8 期。

7 J. A. Pittman, S. Fortin, “Auditor Choice and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for Newly Public Firms,”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Vol. 37, No. 1, pp. 113—136. 范小云、方才、何青：《谁在推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对政府融资的

“资产组合效应”的检验》，《财贸经济》2017年第1期。

8 沈永建、范从来、陈冬华等：《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作用》，《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2期。

9 耿强、付文林、傅坦：《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基于开放 NKPC 框架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2011年第3期。

10 田磊、陆雪琴：《减税降费、企业进入退出和全要素生产率》，《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11 潘凌云、董竹：《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统计研究》2021年第7期。

12 鲁桐、党印：《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分行业比较》，《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64页。

14 首先对月度问卷中各提项的“下降”“持平”“上升”分别赋值为1、2、3，其次计算12个月度数据的均值，最后按照分位数转化为1-5测度标准。

15 Moll, Benjamin,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 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4, No. 10, 2012, pp. 3186—3221.

16 申广军、陈斌开、杨汝岱：《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Liu, Y., and J. Mao. “How Do Tax Incentives Aff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 11, No. 3, 2019, pp. 261—291.